

从追寻符号的魅力到探索中国古代文明

——李学勤先生访谈录

陈颖飞

陈颖飞:李先生,《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委托我给您做个访谈,以便向学界介绍您的学术道路和贡献,我们现在能开始吗?

李学勤:可以。

一 符号的魅力:从逻辑学到甲骨文

陈颖飞:李先生,学术界都推许您学识渊博,在甲骨文、青铜器、战国文字、先秦与秦汉文献、先秦史、思想史等众多领域均有杰出的贡献,那么,能谈谈您从小读书的经历吗?

李学勤:我小时候,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那时候读书全凭兴趣,什么书都读,完全没什么文理科之分,还爱读侦探小说。比如,《科学画报》这个杂志对我影响很大,我七八岁就开始读,每期必买,我的很多自然科学知识都来自这份杂志。所以我对理科比较有兴趣,读中学时理科成绩还不错。跑旧书店是我的一大乐趣,新书比较贵,不能总买新书。当时,我家住北京的东城区,离东安市场较近,我去得勤了,店主、摊主都熟了,称我“李学生”。我想要什么书,他们都会帮我留心,《科学画报》的创刊号,就是一位摊主刘珣先生赠送给我的。除了近处的东安市场外,我有时也去远处的隆福寺和琉璃厂,那是北京古旧书业的中心。那时我没钱坐车,每次都是步行去,一家一家书店看。

陈颖飞:李先生,您少小时的阅读,和您后来所从事的专业有没有直接关系?对您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影响?

李学勤:小时候的一些阅读兴趣我至今一直保持着,近年我还是继续看《科学画报》。这些专业外的阅读激励和满足了我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视野也随之大开,其实,对我的工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陈颖飞:李先生,您理科成绩很好,那个年代又很推崇理工科,您有没有考虑学理工科呢?

李学勤:如果不是因为一个意外,我可能学了工科。我初中毕业后,曾经报考“国立北平高等工业学校”,这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考进这个学校的学生后来很多留苏了。当时我是电机系榜首,但入学体检时,却检测出有肺病,不能入学。我便去另一个医院复查,才发现是误诊。可经过这个风波,我对这个学校没兴趣了,就继续读高中、考大学。

陈颖飞:李先生,您后来为什么选择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呢?

李学勤:我学逻辑,纯粹是个人兴趣。我父亲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我父母都希望我当医生,可是我不喜欢,我觉得自己不适合。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不懂的符号。有一回我

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英国人印的,样子像个皮夹,用非常好的羊皮包着,书里全是看不懂符号,实际上还是英文,是本小说,只是把二十六字母用键盘上的符号代换了,目的是练脑子。我如获至宝,在书包里搁了很长时间。逻辑学就是一种用符号建构的学科。有一次,我读金岳霖先生写的《逻辑》,里面有一章叫“介绍一个新逻辑系统”,其实就是介绍数理逻辑,金岳霖先生是将数理逻辑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我一看,都是不认识的符号,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1951年,我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希望学逻辑学。

陈颖飞:可是,为什么仅仅一年之后您的兴趣就转向甲骨文了呢?

李学勤:1950年,也就是考入清华的前一年,我就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甲骨文也是一种符号,非常难懂,令我着迷。我小时候读书有个特点,越看不懂就越有兴趣,也就越喜欢,数理逻辑是这样,甲骨文也是这样。那时候,甲骨文的书很贵,我就常常骑自行车到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去学习甲骨文。当时,北京图书馆查书很方便,通过查阅甲骨书刊,我结识了馆中负责金石资料的曾毅公先生。曾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除了让我看已经编目的书,还看了不少馆中特藏的书籍、拓本。我开阔了眼界,学习的主要兴趣也从逻辑学转向了甲骨文。

二 破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谜团:多领域的建树

研究轨迹(一):从甲骨文到思想史

陈颖飞:您的第一项甲骨学著作成果是参与编著《殷虚文字缀合》,这是否与您1952年离开清华大学而转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关系?

李学勤:有关系,我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是因为要参与《殷虚文字缀合》这项工作。当时,《殷虚文字乙编》出版,董作宾先生在这部书的序中提出,30年代第十三次殷墟发掘发现的YH127坑甲骨一部分是“文武丁卜辞”,并据此创立了将殷墟甲骨分为新旧两派的说法,这引发了学界对“文武丁卜辞”问题的争论。国内的陈梦家先生和日本的贝塚茂树、伊藤道治先生反对这一说法,认为“文武丁卜辞”实际上就是武丁时候的卜辞。他们的讨论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的上辑与中辑已出版了,《殷虚文字乙编》的下辑还没有印,我就买了一部《殷虚文字乙编》的上辑与中辑,试图自己整理YH127坑甲骨,以便研究“文武丁卜辞”问题。整理中,我发现很多片可以拼起来,就开始缀合,尤其注意“文武丁卜辞”的缀合。恰好那时候,上海的郭若愚先生将殷虚文字甲、乙编缀合的文稿送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郭先生转交考古所,当时经过院系调整,陈梦家先生从清华大学调到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先生征求陈先生的意见,陈先生看了后说:“这书需要再补充,还有两个专门做缀合整理的人,一个老的,一个小的。”老的指曾毅公先生,是外国甲骨文学者明义士(James Menzies)在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助手,专门拼缀甲骨文,有专著《甲骨缀合编》。小的就是指我。那时候全国搞甲骨文的很少,谁做什么都知道。考古所便邀曾毅公先生和我去参加这项工作。于是,我离开了清华大学。从清华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是我学术道路的转折点,从此我正式开始研究古文字和古史。

陈颖飞:《殷虚文字缀合》是您参与的第一个甲骨研究项目,进行了多长时间?

李学勤:这个工作从1952年到1953年末,进行了差不多两年,主要是修改并补充原稿,成果就是1955年出版的《殷虚文字缀合》。

陈颖飞:有的学者说,您在古文字、古史与古文献等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其中之一是您早年研究了思想史,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吗?

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编成之后,有个机会认识了侯外庐先生。我认识侯先生很偶然。那时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一位外交部工作的先生介绍我教一位华侨古文。这位先生认识侯先生,对他说有个小孩教人念古文,侯先生就把我找去,说要建立历史研究所,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决定新成立两个历史所,一个古代的,一个中古的,加上原来的近代史研究所,叫历史研究所第一、二、三所,侯外庐先生任二所副所长。于是,在《殷虚文字缀合》完成不久之后,经过考古所同意,我就从考古所转到历史二所,研究领域也从甲骨文转到思想史。我于1954年春正式到历史二所报到上班,先后在资料室、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还没有研究室。到了夏天,才有研究室,那时叫小组。我就在侯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组工作。

陈颖飞:您调到历史研究所后,直到“文革”前,都是侯先生的助手之一,一直在侯先生指导下研究中国思想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期间的主要工作?

李学勤:1954年,我进入历史研究所,就开始在侯先生身边工作。1964年去搞“四清”,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降临,就不可能做研究。所以工作主要是做到1963年。在这期间,我主要是在侯先生的指导下,陆续参加了一些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1957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唐宋元明)的编写启动,我执笔了部分章节。这都是严格遵照侯先生指导撰写的,成稿后又经他反复修改。1959年《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出版上册,1960年出版下册。在参加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很多学术课题,有的很希望继续研究,但没有机会,尤其是对朱子的研究,当时细读了很多他的著作。前些年读到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又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至今也没有能够如愿。当时我参与编写的书还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历代大同理想》、《中国思想史纲》,等等。此外,我还发表了一些文章,比较集中的是对方以智的研究。1957年,侯先生发表《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在国内首倡方以智研究,此前对他的研究很少。我们也竭力收集方以智的各种资料,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找到方以智侄子方中发的《白鹿山房诗集》,发现了方以智遭清廷迫害而死的隐秘真相。我于1961—1962年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方以智的论文,还标点出版了方以智的未刊著作《东西均》。

研究轨迹(二):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青铜器

1、甲骨文

陈颖飞:李先生,据我所知,1950年代您在中国思想史组期间,虽然主要研究思想史,但是在甲骨文、战国文字、青铜器等不同领域都有开拓性研究。甲骨学方面,您发表了不少对甲骨学影响深远的成果,例如,您出版了甲骨学专著《殷代地理简论》,率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以及提出“非王卜辞”说等等。能谈一谈这个阶段您的甲骨学研究吗?

李学勤:《殷虚文字缀合》完成后,我做的一个工作是用排谱法研究甲骨文反映的史事和历史地理。当时,我受了董作宾先生《殷历谱》排谱法的启发,尝试以地理为线索进行甲骨的排谱,1954年写成初稿,几经修改,1959年以《殷代地理简论》为题发表单行本。另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工作是1956年发表的《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论证了西周甲骨,并意识到其与《周易》有关。1957年,我继续围绕分期问题做了一些工作。这一年,我发表了《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提出对甲骨分期的一些想法,认为卜辞的分

类与断代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应该分开。这一观点是由考古学原则推导来的,后来成为殷墟甲骨新的分期学说的基础。我同期写成的另一篇文章《帝乙时代的非王卜辞》是第二年发表的,在贝塚茂树等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非王卜辞”的概念,并提出区别“王卜辞”与“非王卜辞”的一些标准。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已经证实了“非王卜辞”的存在。另外,这一时期,我也继续做些缀合工作。1957年发表了《论殷代亲族制度》,论证商代日名是死后卜选的。这些研究之后的几年没有时间再专心研究甲骨。

陈颖飞:从“文革”后直到近年,您在甲骨学方面仍然有不少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对甲骨学研究影响深远的历组卜辞早期说,您能否介绍这一时期的甲骨学研究?

李学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的甲骨分期工作有得有失,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将四期卜辞(我后称为历组)归入晚期就是错误的。1963、1964这两年,我先后读了姚孝遂先生发表的一版甲骨以及邹衡先生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对于我五十年代将四期卜辞归入晚期的观点颇有不安,怀疑这组卜辞应该是早期的。1977年,殷墟妇好墓发现,我发表《论妇好墓的年代与有关问题》,正式提出历组卜辞早期说。当时支持新说的学者很少。1980年《小屯南地甲骨》图版出版,第二年我利用这批材料撰写了《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一文,发展了新说。其后,彭裕商先生、黄天树先生都对新说有所推进。1996年,我和彭裕商先生合作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和两篇论文。近十几年来,甲骨学的一些新资料发表,又有一些重要的新发现,如邢台西周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及济南大辛庄甲骨的发现,等等,我也写了一些小文章。

陈颖飞:李先生,除了上面谈到的有关甲骨文研究的贡献外,您从八十年代开始曾多次前往欧美等地,搜集和整理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流散于海外的文物,甲骨文方面就有多部作品问世,为甲骨学界的研究贡献了新的资料,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李学勤:是的,我出过两部这方面的书,都是与齐文心、美国汉学家艾兰合编的,一部《英国所藏甲骨集》,有上、下两集,分别于1986、1992年出版,另一部是《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1999年出版。另外,《四海寻珍》一书也有部分章节谈到了境外博物馆及私人所藏甲骨,这书是我的一部学术文集,1998年出版。

2、战国文字

陈颖飞: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研究思想史、甲骨文的同时,您还开始研究战国文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几十年来,随着战国简的大量出土,战国文字成为古文字的独立分支,几成显学。学界公认您是这一领域的奠基者之一,我看到有文章提到,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两篇文章《战国器物标年》和《战国题铭概述》,“将战国时代的金文、玺印、陶文、货币文字以及简帛等综合起来考察,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①能否请您谈谈当时对这方面的研究?

李学勤:其实战国文字的研究很早就有。很多人,包括一些研究古文字的人可能忘记了,最早发现、最早得到研究的古文字就是战国文字。经过秦代焚书,汉代人已经不能读六国古文。汉景帝时发现孔壁中书,获得古文《尚书》等数十篇,此后,古文开始传习。这些古文书籍,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战国文字。所以早在汉代,战国文字已经发现并开始研

^① 晓云:《文献与考古研究的结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又《介绍李学勤先生》,载《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

究。其后,古文之学一直流传,而古文书籍也仍有发现,西晋时就有著名的汲冢竹书发现,整理出了《纪年》、《穆天子传》等书籍。但是,宋代以后,学者接触商周金文的数量超过前人,金石学兴盛,战国古文逐渐被忽视。晚清时,战国文字材料比较多的出现,但注意的人还是不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了一系列新的战国文字材料,我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是研究这些新材料的,即《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材料》,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同年六月,《战国器物标年》发表在历史所的内部刊物《历史学习》上。1957年,我发表了《信阳楚墓中发现的战国竹书》,论证了这批简的性质,其中一些看法,我后期已有纠正。1959年发表《战国题铭概述》,在王国维先生东土、西土两系说的基础上,提出齐、燕、三晋两周、楚、秦五系说。这篇文章后来有些影响,很多朋友曾勉励我修改扩大,印成一本书,我未敢应命。现在回过头重读,许多地方已陈旧过时了。不过,因常有友人询问我年轻时的作品,而我又苦于难以应命,便将早期的文章结集,2008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其中就包括这篇文章。

3、青铜器

陈颖飞:李先生,您是青铜器研究的大家,成就卓越,这一领域的研究是什么时候展开的?

李学勤:1957年前后,我发表了一些青铜器的文章,如《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鄱县李家村铜器考》等。1959年发表的《战国题铭概述》包括了战国金文材料,也可以算与此相关。在这些研究中,虽然关注到青铜器的器种和形制,但主要的内容还是铭文。我把研究重点放到青铜器上是七十年代以后。

陈颖飞:您在纪念马承源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您早在1973年就曾去上海博物馆专门看一件商代的卣,那时候您是否已经在专门研究青铜器?您为什么把研究重点放在青铜器上?

李学勤:我把研究重点放在青铜器上,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自觉功力不足,需要从金文扩充到青铜器的其他因素。七十年代,我开始有一些机会参观接触海内外青铜器,为我研究青铜器提供了客观条件。1971年冬天,我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修订。当时,为了重写其中的商、西周部分,迫切需要搜集新的文物材料。马承源先生曾寄来小臣单觶的照片。1973年,我去上海与杨宽先生讨论《中国史稿地图集》先秦部分的绘制,并同去上海博物馆参观,马承源先生就在这时候给我们看那件商代的卣,还看了其他一些青铜器。

陈颖飞:1975至1985这十年,您的青铜器研究尤为重要,发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论文,对学界影响很大,也奠定了您此后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的基础。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李学勤:1975至1985这十年,青铜器研究是我的研究重点,发表的论文,可分为新发现材料和传世青铜器材料两类,前者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其中有的论点现在看来虽然过时了,但很多观点以及研究思路还是对的,在我后来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当时,我特别注意青铜器的分期、分区、分国别的研究。这个集子里讨论的很多问题:盘龙城与商代南土、妇好墓的年代、西周时期各国青铜器、东周时期中原以外一些地区的青铜器,都是这方面的。研究青铜器分期时,强调并提出了一些标尺,如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等。使用综合的系联法研究铭文,并以铭文材料研究当时的一些制度。

陈颖飞:继《新出青铜器研究》之后,您还有一部名为《青铜器与古代史》的专著,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2005 年出版。这部新近的著作有什么特点呢?

李学勤:《青铜器与古代史》从交稿到出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这可能是因为造字排版等方面的困难。这部书着重于古代史方面,然后主要是以时代为序就夏商周秦汉的若干重要铜器及其铭文论析古代史的相关问题。现在看,里面的想法,不少已经过时了。近年青铜器有很多新的发现,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分别发表了,后来收在我的一些集子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文物中的古文明》、《通向文明之路》等文集里都有这类文章。

陈颖飞:除了以上提到的专著外,您还有两部青铜器概论的书:1980 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和 1996 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概说》,且都有英文版,在西方流传很广,对于传播中国青铜器文化有很重要的作用。您当时在撰些这两部书稿时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李学勤:1979 年,我应北京外文出版社之邀,写了 *The Wonder of Chinese Bronzes*, 1980 年出版。这本小书是配合“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在美国巡回展出而写的。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在 *Early China* 发表书评,认为这书对专门研究青铜器的学者和一般有兴趣的读者都有裨益。1987 年,香港商务印书馆以《中国青铜器的奥秘》为题,印行了中文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已有很大发展,该书的内容有不少需要修订,外文出版社邀我在此基础重编,这就是《中国青铜器概说》的缘起。1996 年同时出了中文版和英、法、德文版,书中除了介绍青铜器研究的基本知识,还涵盖了当时的各种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新的英文版 *Chinese Bronze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于 2007 年出版。

陈颖飞:青铜器研究方面,您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介绍海外流失的青铜器,尤其对于流失欧洲的青铜器,您编撰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影响很大。还请您简单谈谈这部著作的相关情况。

李学勤:《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是我和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一起编撰的,1995 年出版。但工作很早就开始做了,早在我和齐文心先生一起编撰《英国所藏甲骨集》将要完成的时候,便想到要编写一部欧洲各国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选集,所以书中大多数器物,是我们 1986 年在欧洲旅行访问各博物馆和藏家时选定的。全书共收录各类青铜器 210 件,另附录 7 件,绝大部分我们都直接观看了原件。

陈颖飞:您在青铜器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您提出的很多观点,如从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工艺五个方面综合研究青铜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若干标尺,青铜器发展的两个高峰等等,已是学界共识,能否请您谈谈当前的青铜器研究最需要做的工作?

李学勤:青铜器研究首先应该以考古学为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做到的。宋人开始的金石学,主要研究金文,对形制等不重视。现代青铜器研究的标志,是郭沫若 1931 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系统整理了两周金文,同时对青铜器的器形也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有划时代的意义。继而全面研究青铜器的是容庚先生,他的《商周彝器通考》是全面系统研究青铜器的著作。20 世纪的 30 年代,国际上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出现了用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整理,着重研究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青铜器研究的新局面。

但是,当时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材料还很有限,做不到以考古材料作为青铜器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近几十年新发现很多,虽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传世的,但是完全可

以考古材料为基础,以传世品为补充,进一步建立青铜器研究的体系。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青铜器,就不能仅研究金文,而要从多层面、多角度去研究。毕竟青铜器和甲骨一样,都是考古遗物,首先应当用考古学的方法来整理研究,而整理的中心要求便是分期、分域。关于分期,我曾有篇题为《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的小文,建议“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强调考古学的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继之再以古文字学等去论证和细化。同时,当了解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谱系。”

研究轨迹(三):从马王堆帛书到清华简

陈颖飞:上世纪50年代,您研究的领域涉及甲骨文、思想史、战国文字、青铜器,六十年代初期您主要研究思想史,七十年代初您参加《中国史稿》的修订,这之后,1974年,您开始参加新出土简帛的整理研究,至今,这方面研究仍是您工作的重点。您是怎么开始研究简帛的呢?

李学勤: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竹简。第二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又出土了大量的简帛。这两个墓都是汉代的,前一个是汉武帝早年的,后一个是汉文帝初年的。这些简帛佚籍的发现,真是石破天惊,立即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焦点。当时,国家文物局专门组织人员整理研究这些简帛。1974年,我开始参加这一工作。1975年1月,我正式借调到国家文物局,专门从事简帛的整理。当时我们主要在北大红楼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曾暂时迁到紫禁城里的城隍庙。直到1978年我调回历史所,我都在全力做简帛的研究工作。

陈颖飞:1978年您回历史所之前,有一系列重要的简帛发现,包括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定县八角廊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双古堆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等,您参加或主持了其中一些整理工作,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李学勤:这个阶段,我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是马王堆帛书和睡虎地秦简。1975年1月,我调到文物局,进的就是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我主要拼复了一些医书和阴阳五行类的书,包括《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刑德》、《阴阳五行》等;此外,唐兰先生拼复的《春秋事语》一种,我也拼了一份,我们的成果基本一致。1975年冬天,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的竹简,当时我直接到现场去,看到满满一棺材都是竹简。这是第一次看到用墨笔书写的秦人手迹,主要是秦代的法律。随后整理工作就开始了,我做了较多整理注释工作。其他一些简,如1973年发现的定县八角廊汉简、1978年发现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等,我参加了部分整理工作,有的是我主持的。

陈颖飞:1978年回历史所之后,您的竹简工作并没有停止,还主持了张家山汉简的整理吧?

李学勤:是的。1978年后我回到历史所工作,只是回去上班,竹简的整理工作还是在继续做,只不过不再像1974—1978年那样用全部时间在做。1983年有一个重大发现,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主要是汉初吕后时代的法律,还有一些兵书、遣策。这批简的整理报告已经出版了,近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已经有不少成果。

陈颖飞:据您刚才所说,您专职做简帛研究,始于秦汉简帛,而且始于整理工作。那么,除了整理工作外,您还有其他不少对秦汉简帛的专门研究吧?

李学勤:是的。整理秦汉简帛时,这些简帛佚籍太吸引我了,当时就写了若干篇小论文,后来将其中的一部分补充修改,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这个集子,1994年先由台湾

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繁体本,2001 年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了简体本。《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所收的文章,除了以上谈到的我亲身参与整理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简、张家山汉简等秦汉简帛外,还包括了我未参加整理工作的楚帛书、长台关楚简和其他汉简的研究。这本小书当时取名为“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是希望将最“物质”的考古学同最“精神”的学术史相沟通。此外,秦汉简帛的研究,比较集中的,是研究马王堆帛书《周易》而作一系列小文,后来补充修改撰成《周易经传溯源》一书,1992 年由长春出版社初版;2006 年增订修补,改名为《周易溯源》,由巴蜀书社重版。

陈颖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战国简成为您研究的重点,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学勤:战国简的最早发现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长沙五里牌等地发现的楚简,不久又发现了信阳长台关楚简等,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些战国楚简陆续发现,但数量较小,内容主要是遣策。七十年代最重要的发现主要是汉简和秦简。七十年代末期,情况开始改变,战国简不断出土与发现,每批简的数量大增,内容主要是遣策与文书,如曾侯乙简、包山简、望山简等。九十年代以后,战国简的发现更为重要,不仅各批简的数量较大,而且内容以书籍为主,最重要的有 1993 年的郭店简、1994 年入藏的上博简以及最近的 2008 年入藏的清华简。我的战国简研究是伴随这些发现而发展的。我最早写的战国简文章有一篇是 1957 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当时信阳长台关楚简刚发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做这方面工作。像刚刚说过的,七八十年代,我的工作重心是研究秦汉简和青铜器。八十年代末期,包山简的一些材料发表,我便写了几篇包山简的文章。这一时期,我对长台关楚简中的《墨子》有些新的看法,写了篇小文章,题为《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1990 年发表在《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上。这些工作是比较零碎的,我真正将主要精力放在战国简研究上,是在郭店简发表以后。郭店简是 1998 年发表的,同年我便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文,讨论郭店简中的篇目及其在学术史、文献学上的意义。不久,我在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开了一个简帛研读班,和一些学者、同学一起研究郭店简。后来随着上博简的发表,这类工作也延续下来。2008 年,清华简从海外抢救回来后,我主持整理工作,计划要做十年左右,现在我正全力做这个工作。

陈颖飞:我们知道,清华简是 2008 年 7 月入藏的。消息传出后,不仅学界沸腾,公众也颇为瞩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物报》、《文汇报》等众多的报纸报道相关信息,《光明日报》国学版更辟专栏刊载此类文章,《文物》、《中国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重要期刊也发表了论文。能否请您简单介绍清华简的情况?

李学勤:好的。2008 年 7 月入藏的清华简,性质比较接近孔壁、汲冢的竹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清华简所作的工作,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这批简于 2008 年 7 月 15 日运抵清华到 10 月中旬,开展全面的抢救清理与紧急保护。这个工作一完成,2008 年 10 月 14 日,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与会的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这批竹简应是楚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简册,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等等。

第二阶段,2008 年 11 月到 2009 年 1 月,工作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在竹简不脱水的条件下,对全部简进行拍照,以保存简的原貌,并委托北京大学有关单位对无字竹简残片

做了 AMS 法 C14 年代测定,结果是公元前 305 ± 30 年,与由考古学、古文字学做出的估计吻合。

第三阶段,从 2009 年 3 月春季学期,利用照片,逐次审读全部竹简,进行分类分篇、缀合编排。

第四阶段,从 2009 年 9 月至今,确定第一册出版篇目,写出释文并反复讨论。从初步考察来看,清华简都是书籍,没有战国简中常见的卜筮类材料及遣策,而且多属“经、史”典籍。其中,与古史相关的颇多。比如,《尚书》一类的文献较多,有的传世今文《尚书》中有,有的孔壁古文《尚书》里有但久已不存,还有的见于今本《逸周书》或今本《逸周书》已佚失。又如,还有同汲冢《纪年》相提并论的一部史书。清华简对于先秦历史文化研究的影响,现在讲为时过早,但通过初步考察,可以看到以下几点: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商周之际变革最为剧烈,是有道理的。2、清华简的一些篇,进一步证明西周的传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孔子儒学的依据和基础。3、中国传统久远的礼乐制度所反映的文化精神,从清华简的一些篇里可以寻求出根源。4、这批简大多数内容与史有关,我们甚至可以猜想出土的这些简的墓葬主人就是一位史官。5、从文字特点来看,清华简是楚简,与郭店简、上博简一样,均属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战国中期后段,这使我们看到,自西周以来被贬斥为蛮夷的楚国,这时也已深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而且对这一文化传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颖飞:八十年代以来战国简的大量发现,带来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兴盛,您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对于这些新发现的战国简又有很多研究与贡献,能否请您谈谈战国简帛的发现对于战国文字乃至古文字研究的意义?

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使战国文字乃至古文字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以往的古文字研究,主要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向上追溯,以识读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研究则比较困难,过去学者在论述文字源流时往往空缺了这一段,因为战国时期“文字异形”,有秦、三晋、燕、齐、楚等系,秦并六国后,“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六国文字于是废绝不可识读,而且有关材料十分零散。现在新发现了许多战国简帛,其中不少书籍能与传世古书直接对照,我们便能认出许多僻字、难字,识读战国文字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不仅如此,简帛研究中获得的新知识,还有不少能用来识读以前不认识的甲骨文、金文。目前,战国简帛的发现正将战国文字乃至古文字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轨迹(四):其他文物与考古

陈颖飞:李先生,您的研究范围,单以文物而言,不仅包括上面所说的甲骨、青铜器和简帛,还有玉器、陶器、漆器、早期铁器等其他文物。比如,玉器方面,您就有很多研究,能否给我们简单谈谈?

李学勤: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极受重视,不仅有装饰的作用,并且常作为礼器,起着特殊的作用。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早期玉器。我利用这些考古发现,做了一些工作,涉及的方面较多,比如,讨论良渚玉器纹饰与商代青铜器饕餮纹的关系、良渚文化刻划符号与文字起源的关系、考察含山凌家滩玉版与古代的八方观念及宇宙观的关系、从广汉与成都金沙的玉器讨论蜀与各地的关系、以益门村玉器的蟠虺纹看春秋战国时期蟠虺纹的发展,以及其他流散海外玉器的研究。你可以看到,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部分,玉器研究与其他一些研究是相通的,比如,玉器的纹饰与青铜器的纹饰有密切联系,玉

器的刻划符号关乎中国古代文字的起源问题,玉器的一些图案可能涉及到中国古代某些观念与思想,等等。

陈颖飞:在陶器方面,您主要研究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与文字。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您写《战国题铭概述》时就使用了陶文材料,八十年代初,您撰写《山东陶文的发现与著录》一文较早地介绍了陶文的发现和研究史。九十年代后,您又有《燕齐陶文丛论》、《论田齐陈固陶区》等文章发表。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好吗?

李学勤:陶文研究中,战国陶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战国文字的重要材料。目前,战国各国的陶文,如周、韩、赵、魏、燕、秦,都已发现,但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是山东出土的陶文。因为认识到陶文的重要性,我五十年代就注意使用这方面的材料,后来又写了几篇关于山东陶文的文章。

战国陶文的研究是有传统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著名学者陈介祺,他鉴定、收藏、考释了一些陶文,并将拓本辑为《簠斋藏陶》一书。在他的提倡下,清末的一些学者,如潘祖荫、王懿荣、刘鹗、端方等都收藏陶文。近代又有一些学者研究陶文。我写的《山东陶文的发现与著录》就介绍了这些情况,具体可以看看。

陈颖飞:除了战国陶文外,陶器的刻划符号是您陶器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这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字起源问题,争论很多,例如,丁公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不是文字,曾引起强烈争论,能否谈谈您的观点?

李学勤:1992年,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发掘人员在山东邹平的龙山遗址中发现了一片有字陶片,有11个字,排成五行。材料发表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第二年,《考古》杂志社就组织一些专家讨论丁公陶文,我也参加了,讨论稿后来以《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为题发表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很感兴趣,后来又写了《古汉字书写纵向与丁公陶文》、《邹平丁公陶文试探》等几篇小文章。丁公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不是文字,虽然学界争论强烈,但多数学者认为是文字,我也持这种看法。

陈颖飞:您的陶器研究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研究西周陶器上的筮数,能否谈谈相关情况?

李学勤:“筮数”就是学界讨论热烈的“数字卦”,不仅在陶器上有,在甲骨、青铜器、石器 etc 文物上都有发现,这是近几十年易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陕西凤雏出土的周原甲骨发现筮数以及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楚简上发现所谓的筮数后,这个问题便成为学术焦点。后来又有一系列相关的新发现,如包山楚简(1983)、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1993)、新蔡葛陵楚简(1994)、上博楚简《周易》(1994)、长安西仁村陶拍(2001)、房山镇江营卜骨(1986-1990)、扶风齐家村卜骨(2002)等都有相关材料。我在《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以及《出土筮数与三易研究》、《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论战国简的卦画》等文章里讨论了这些材料以及“筮数”问题。我认为,这些材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甲骨和西周陶器上筮数,另一类是楚简上的卦画,正如我在《出土筮数与三易研究》一文所说,“迄今已发现的筮数的时代限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中叶;卦画在出土文物中的出现,则只能追溯至战国中晚期,和筮数并不相接,也没有传袭关系。”这个看法当然还可进一步研究。

陈颖飞:在文物方面,我们知道,您是文物鉴定大家,以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鉴定,享誉海内外学界。多年来,您一直作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鉴定了大量的文物,尤其

是近些年,国内文物流失严重,您的鉴定为国家及时抢救了许多流失境外的国宝。那么,这项本领您是怎么学来的呢?

李学勤:文物鉴定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要看的東西多。老一辈的鉴定家,有些本人是收藏家,还有些就是在古玩铺里做学徒学出来的,那里有条件。我在清华大学开青铜器课程时,有学生问青铜器鉴定怎么学,我就讲,鉴定很难在课堂上学会,学这些需要多看多摸材料,大学里没有这个条件。我能作文物鉴定工作,是因为我经常走访国内外的各种文博单位,看了很多东西,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我的相关研究结合,便能对一些文物的真伪及年代问题提出自己一些见解。

陈颖飞:您刚刚提到经常走访国内外的文博单位,我们知道,您不仅看文物,而且还研究,尤其是对于流散于海外的中国古代文物,您每每选取有价值的撰文介绍与研究,您的《四海寻珍》便是这方面的专集,而《比较考古学随笔》、《走出疑古时代》等文集也收录了若干这类文章。李先生,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学勤: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中国古代文物流失海外,已有不少前辈学者注意搜集和研究海外中国文物材料,如中国学者容庚、陈梦家,日本学者梅原末治等。我自己做这方面工作,始于1979年,我先后去澳大利亚、美国访学,考察了一些文物,便写了《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发表在《文物》1979年12期上。这是我最早的一篇介绍海外文物的文章。此后,我多次出国访学,参观了很多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私人藏品。看到一些特殊的文物,我就写些笔记,后来这些笔记整理为《海外访古记》以及《海外访古续记》陆续发表。1997年,为了向学界汇报清华文科复建后的成果,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国际汉学研究所,计划共同编辑一套“新清华文丛”,当时我已在国际汉学研究所,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向我约稿,我便将《海外访古记》等以往的介绍海外文物的笔记文章汇编为专集,定名为《四海寻珍》,交予出版。

研究轨迹(五):从古史、古文献到夏商周断代工程

陈颖飞:李先生,您的文章中常用到“古史”这个词,“古史”是不是“古代史”?

李学勤:“古史”不是通常说的“古代”。“古代”是相对“近代”而言的。“古史”指“上古史”,就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古史辨”、“古史新证”、“古史重建”等提法中的“古史”,也就是学术界通称的“先秦史”。

陈颖飞:李先生,我们知道,您在古史方面的贡献很多,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981年,您提出“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主张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这些提法主要出于什么考虑?

李学勤:当时,学术界长期流行着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的观点,而从考古发现来看,青铜器、城市、文字等文明的重要因素在商代以前已有很长的过程,所以我提出要重新研究古代文明的起源。

陈颖飞:您在古史研究上的另一个大贡献是提倡区域文化研究。1981您就发表了《新出简帛与楚文化》一文,较早地从新出简帛的角度讨论楚这一地区文化。1984年,您的专著《东周与秦代文明》出版,提出“文化圈”的概念,分国其实也就是分区域地讨论了各国文明。1988年,您发表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圈》,发展了“文化圈”的概念。1989年,您又发表了《多彩的古史地区文化》,大张旗鼓地提倡地区文化研究。此后,您陆续发表了《丰富多彩的吴文化》(1990)、《楚青铜器与楚文化》(1991)、《河洛文化的性质》

(1994)、《夏商周与山东》(2002)、《越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中的地位以及对东亚历史文化的影响》(2004,与江林昌合作)、《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2005)、《中华文明起源与山西》(2009)等一系列研究地区文化的文章。由于您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大力提倡,区域文化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古史研究的一大热点。您为什么提出“文化圈”的概念,并提倡区域文化研究呢?

李学勤:我在《东周与秦代文明》里提出“文化圈”的概念,是想把古文献与考古发现综合起来,将古代中国划分为若干“文化圈”。1988年初,我在《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圈》一文里引申了这个概念,实质上就是想提倡地区文化的研究,但是没直接讲。第二年,我写了《多彩的古代地区文化》,直接讨论地区文化研究。在文中,我说了研究地区文化的必要性,恰好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简单讲,研究地区文化对于考古学、古代史、思想史、学术史都有重要意义。考古学上的文化,本身就有明显的地域性。古代史方面,从原始时代到夏商周三代,从氏族部落到方国,都是分地区或有地区基础的,只有详细研究各个地区,才能真正把握古史。至于思想史与学术史,古代的学术思想的流派,常有很强的地域性,忽略这一点,难以辨章其学术、考镜其源流。所以,我们提倡开展地区文化的研究。

陈颖飞:古史研究的一大基础是古文献,即古书。1986年,您发表了《对古书的反思》一文,提出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反思,那么什么是第一次反思,您为什么这么提?

李学勤:这一问题,我在小文《对古书的反思》已经说了。过去的很长时间,古书是认识古代文化的惟一渠道。近代出现了疑古思潮,对古书进行辨伪,是古书的第一次大反思。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现代考古学建立并发展,为认识古代文化提供了一条新的渠道。随着考古成果的大量涌现,尤其是近年出土大量简帛书,人们得以亲眼看到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对古书便有了很多新的认识,这可以说是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

陈颖飞:李先生,学界都知道,您对古文献研究贡献极多。您研究《周易》的专著《周易经传溯源》,解决了很多《周易》研究中的难题,被易学大家金景芳先生赞为“元元本本,殚见洽闻”。文集《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明确强调“二重证据法”,并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周易》、《周礼》、《左传》、《孙子》、《墨子》、《鹖冠子》、《吴越春秋》等古文献,又明确提出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堪称简帛研究的典范。《古文献论丛》是研究古文献的专著,汇集了您研究《周易》、“黄老”书、《管子》、《文子》、《鬼谷子》、《逸周书》等古籍的一些论文,其中不少文章影响很大。近年,郭店简、上博简等新材料发表,您以此研究传世古籍,有很多新的见解,多为学界熟知。您在这方面取得如此多成就,有什么东西贯穿始终么?

李学勤:有两点,一是二重证据法的使用,二是强调学术史意义。古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两者密不可分。20世纪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材料,研究这些材料,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是最重要的方法。反过来,研究传世文献,也必须使用“二重证据法”,充分地运用出土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这才能有好的成果。另外,我前面已经说了,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尤其是简帛材料,与学术史有密切关系,对研究学术史有重要意义,所以我自己在研究具体的出土文献时比较注意探究这一意义。

陈颖飞:李先生,您对古史研究的还有一个大贡献,就是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进行一系列年代学的研究。1995年,您受命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和专家组组长。请您介绍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项目,好吗?

李学勤: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呢?简单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用自然科学与

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西周的年代学。什么叫年代学？年代学就是要给古代历史一个时间的尺度。“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按照系统工程原则建立的大型年代学项目。经过5年的集体努力，最后达到了预定目标，制定了“夏商周年表”。2000年9月，项目顺利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了阶段性成果，《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也正式出版发行。2001年春天，被评为“九五”期间科技攻关计划的重大成果。

陈颖飞：“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目标就是制定“夏商周年表”，以往也有这类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这个年表有什么不同呢？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是为了做一个年表，这张年表即使用大一点的字，也完全可以印在一张纸上。可是年表的产生是非常之困难的。以前的年表多得很，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年表，有些点看起来和那些个还真没有太大不同，可是我们这个年表的特点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科学支持。这个年表的每个数字，都要尽量给出科学说明，而不仅根据古书记载，古书有错的多了。

陈颖飞：李先生，您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否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相关？前面我们提到，1981年，您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就提出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十年后，即1991年，您又发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一文，介绍文明起源的理论、近十几年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并对中国古代各种文明因素进行了溯源。可见，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一直非常关注。

李学勤：是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是做一个年表，但是它的目标不仅是做这样一个年表，而是为今后进一步探寻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打下基础。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有自己独立起源和发展途径的文明国家之一。大家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没有中断，绵延不绝，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光辉的奇迹。可是中国的文明，究竟有多么长远的历史，不是没有怀疑的，我们需要把它弄清楚，仅仅说古书上是怎么写的，这不行。实际上，我们国家确切的历史年代只能上推到公元前841年，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当然，其他几个古代文明最早的确切年代大致也在这个时期，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越古的就越模糊。往前还有没有呢？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公认的说法。外国的情形也是一样，也是有很多的分歧，很多的模糊，但是通过学者反复研究，是有望达成共识的。中国古代就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这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我们到底有没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发展的水平究竟怎么样？研究这类文明起源问题的一个基础就是确定夏商周的年代，也就是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

陈颖飞：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海外有些争议，您对这些争议是如何看的？

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大型工程，跨多学科，大家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国外学者有不同意见，国内学者也有不同意见。只要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性意见，我们都欢迎，我在美国亚洲学会的讨论会上就曾经这样表示过。

三 方法论的倡导：从走出疑古时代到二重证据法

陈颖飞：李先生，我们知道，您治学有一大特点，不仅做具体的研究，而且非常强调方

法论。您自己就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方法论方面的观点,最有名的就是“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影响巨大。它们后来都成了您的文集名称,代表了您的学术方法和思想。能否请您先谈谈“走出疑古时代”是如何提出的?

李学勤:1981年,我有“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提出要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重新估价其高度,并且明确反对极端的疑古。后者就是11年后,即1992年,我另一个演讲《走出疑古时代》的滥觞。这篇演讲稿后来影响很大,1995年我出一个集子,就以此为题。所谓“走出疑古时代”,是针对“疑古”时代而言的。

“疑古”时代,是指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盛行的时期,特点是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的内在关系辨伪。现在时代不同了,有大量考古新发现,可以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不能做到的。所以我提出,在这种新条件下,应该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摆脱一些旧的观点,以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陈颖飞:“重写学术史”,您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提?

李学勤:在1992年《走出疑古时代》那篇演讲稿里,有一节专门谈“学术史的再认识”,提到“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这是最早提“重写学术史”。1994年我出版了《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以“学术史”为题,并在《自序》中说“简帛佚籍的发现,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史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以为其影响最大的乃是学术史的研究”,其实就是建议以简帛佚籍重写学术史。后来,当我将1998、1999两年的小文章汇集出版时,就以“重写学术史”为书名了。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提,看看重要的简帛发现有哪些内容就能知道。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兵书,《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最重要,尤其《孙臆兵法》是佚书,解决了学术史上是否有孙臆兵法之争。1973年,长沙马王堆又出土了大量的简帛,帛书最多,内容很广,大部分是失传的书籍,涉及儒家、道家、兵家、数学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周易》、《老子》等书籍,分别是儒道两家最重要的经典。同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了《论语》、《儒家者言》等儒家典籍。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秦简,主要是秦代的法律,与法家相关。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出土了竹简,有《周易》、《诗经》等重要儒家经典。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以汉律为主,还有一些兵家著作、遣策等。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大量战国简,都是儒家和道家的著作。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来一批战国简,内容和郭店简相近,也主要是儒家、道家的书籍。2008年,清华大学又从香港抢救回一批战国简,内容非常丰富,最重要的是有《尚书》及《尚书》类的篇章,影响重大。这一系列的发现,涉及先秦儒家、道家、兵家等各家的典籍,而且不少是佚书,连司马迁、刘向、刘歆都没有看到,这就促使学者对古书的看法发生改变,也为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不少久被怀疑为“伪书”的,证明是先秦古籍,我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就是从这一现象出发的。佚书的大量出现和一些先秦古籍的辨真非伪,历史上若干方面,特别是学术史、思想史,就有重写的机会,所以我提出“重写学术史”。

陈颖飞:李先生,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您为什么这么提?它与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有什么关系?

李学勤:这还是要追溯到1981年“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篇演讲。我用“中国古代文明”的说法是有原因的。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等是现代的学科分科,这样分

科是我们为了教学科研方便而设的,实质上,文明是一个整体,涉及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等各个方面,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可能是属于某个学科的范围,但从研究的整个视野以及努力的方向而言,我希望尽可能把中国古代文明看作一个整体去研究。

陈颖飞:李先生,据您刚刚所说,“走出疑古时代”、“重写学术史”、“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这三者都始于“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这篇演讲,三者之间有密切联系吧?

李学勤:当然。刚刚说过了,我们现在有大量考古新材料,有必要解放思想,“走出疑古时代”,这样便能“重写学术史”乃至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是前提,“重写学术史”和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是结果。

陈颖飞:李先生,您有个文集叫《比较考古学随笔》,大力提倡比较考古学这一新方法,您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为什么要提倡“比较考古学”?“比较考古学”应该怎样理解?

李学勤:1984年,我发了《中国和古埃及文字的起源》一文,以比较法试谈文字起源。此后,我使用比较法研究考古学,陆续写了一些文章,1991年将20篇这类文章结集为《比较考古学随笔》,在香港出了繁体本。五年后,我补充了10篇此类的新文章,在大陆出版了同名简体本。2003年,我又写了一篇《比较考古学续笔》,后来收入文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讲“比较考古学”,已持续二十余年。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讲,我在《比较考古学随笔》“引言”里有说明。提出“比较考古学”,是想强调比较研究在考古学中的重要性,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这种研究方法,使考古学——特别是中国考古学获得更丰富的成果。具体的说,我提倡“比较考古学”,是因为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考古文化,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的同异,能够揭示一些文化之间交流影响的关系,并对各个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我将中国考古学范围内的比较研究分为五个层次:1、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2、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3、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4、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研究;5、各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

陈颖飞:除了提出新的方法论外,您还大力提倡前辈学者的某些方法论,最主要的就是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为什么呢?

李学勤:“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研究院教课时提出来的。当时,他开了门“古史新证”的课,以“二重证据法”贯穿整个课程。王国维先生这门课的讲义,199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讲义开头是“总论”,王国维先生在此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二重证据法”就是“纸上之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的互证。在新材料大量出现的今天,“二重证据法”是研究出土文献与古史的最重要方法,大家重新考订个别古书真伪,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二重证据法”。

四 为学之“道”:理论、材料、眼界

陈颖飞:李先生,从上面的访谈我们已经知道,您在甲骨文、青铜器、战国文字、玉器与其他文物、古文献、先秦史、思想史等等各个方面都成就卓越,学问之渊博与精深,常常令我们有高山仰止之感,能否请您谈谈,应该如何做学问?

李学勤: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叫《理论、材料、眼界》。我当时讲,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需要理论、材料、眼界三方面的需要结合起来,我现在还是这么看。理论指引我们的方向,开拓我们的视野;考古新材料使我们能超过前人;我们研究一个具体问题,目的似乎是狭小的,但有了正确的方向、广阔的眼界,就能深入拓展。其实,具备理论、材料、眼界三方面的修养,不仅是研究古文字和古代史的需要,研究其他学问也是如此。

陈颖飞:您刚才从总体上谈了如何做学问,如果具体到某一方面,比如,古文字应该如何学习与研究呢?

李学勤:古文字很难,介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各个学科之间,是交叉学科,需要有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所以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古文字很难学,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毅力,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和途径。如果系统学古文字,有两种学法:一种是由《说文》开始,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另一种是先学自己有兴趣的,如甲骨文或金文,然后再学其他。想在古文字范围内有所建树,需要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不过现在材料太多,已经很难做到了。学习与研究古文字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传世文献材料对照阅读与研究。学到一个程度,有了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谨慎,长期不开笔,容易眼高手低。

陈颖飞:李先生,您刚刚说了,现在材料太多,那么像您这样全面研究古文字已经很难了,现在大多数学者可能只能专研某一种古文字,如甲骨文等。您从17岁开始研究甲骨,至今已经近六十年,对甲骨学有诸多贡献,能否介绍一下您学甲骨的经验?学甲骨应注意什么?

李学勤:学甲骨文是很不容易的,我以前有篇小文章曾讲过,学甲骨有五难,书难读、材料难得、文辞难解、论点难抉择、进展难跟上,所以需要很多时间精力。我说了,我学甲骨是自学的。一开始就是看考古发掘报告,注意甲骨发现和研究的历程,仔细读了《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等等。现在来看,这是正确的。另外,我学甲骨初期便自己动手整理,这也很重要。陈梦家先生为《甲骨缀合编》撰序,就指出,“若不经这种技术的手续,则研究本身是无从入手的。”总之,研究甲骨文,不仅要关注文字,而应该从考古学入手,把甲骨作为一种考古遗物,加以全面研究,既要注意文字,也要注意甲骨的出土地层、坑位及钻凿形态,既要研究有字甲骨,也要关注无字甲骨。

陈颖飞:李先生,上面提到,您研究青铜器,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可是成就巨大,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经验?

李学勤:我学青铜器曾做了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我还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按照我们大概知道的青铜器分期,把有关的报告、简报整个读一遍。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地从早期开始,看有哪些发掘,有哪些材料,一代代往下看。比如,先看夏商的东西,我们先看如二里头、郑州等发掘的材料,然后是与殷墟发掘有关的材料,再看西周初年的,西周中期的等等,一点点的往下看。这样过一遍。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尽可能的训练眼力,不同于现在一般的通论性质的书。当然,我做这工作是六七十年代,那时候材料比现在少得多啦。今天要做这个工作,整个通读一遍,有可能是做不到的,因为材料太多。可是,分时期分地区来做,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样可以训练研究青铜器所需的“眼学”。另外,现在有一个条件很好,博物馆很多,大家还可以去看实物。

总结与展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想做而未做的事

陈颖飞:李先生,访谈临近结尾,我们想请您总结一下您的学术。您的研究领域这么广博,有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

李学勤:有,就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我在《走出疑古时代》这个集子“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走出疑古时代》是我最近几年继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事实上,我此前此后的所有研究基本都在做这个工作,从古史、古代文明起源、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年代学研究,到学术史研究,都可以归入这个范围。所以,我的很多文集都以“文明”为题,《中国古代文明十讲》(2003)、《中国古代文明研究》(2005)、《文物中的古文明》(2008)、《通向文明之路》(2010),都是这样。这些集子也都和《走出疑古时代》所说的一样是我“继续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果”。所以说,探索古代文明,或者说是“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贯穿了我整个学术研究。

陈颖飞:李先生,您被称为是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那么有什么想做而未做的事吗?

李学勤:有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学俄文,读了不少苏联考古学的书,这些书就给我一个印象:世界的古代文明,就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时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中国的第一手材料。对于中国上古的材料,他们接触得很少。当时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直接把中国古代和外国古代做比较性的研究?但是,你知道,做这个研究是非常难的,首先要对中国古代有充分了解,然后对外国古代文明,至少是一两种,也有充分了解。最理想的是能研究古希腊罗马,再研究古代埃及,再研究古代中国。这就太难了!要这三方面都做到,有一个前提,就是至少要会两三门现代语言,再学这三个古文明的语言。那时候我真是想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是我的一个梦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许我至少能够做到一部分,并不是完全做不到。

陈颖飞:李先生,最后,能否请您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作些展望?

李学勤:这个问题我曾在北师大的一次演讲里谈到过,有五方面。第一,近年来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沟通不理想,如果我们在教育体制和思想认识方面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将大有促进。第二,我们一定要做些必要的理论探讨,使大家在认识一个问题时有广阔的文化背景,能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去认识。第三,应该充分吸收众多邻近学科的成果。第四,要更加系统地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这种比较法和一般的偶然比较不同,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法。第五,将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定要走多学科结合的道路,特别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

陈颖飞:李先生,最后,我代表《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诚挚地感谢您的接受访谈,恭祝您身体健康!

李学勤:谢谢!

(采访者通讯地址:陈颖飞 北京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100084)

(责任编辑 晓 宁)



李学勤先生 1933 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1997 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6 年被推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先秦史和古文字学,主要涉及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和简帛学等诸多方面。在甲骨学研究中,建立了殷墟甲骨“两系说”的分期理论,发展了“非王卜辞”的研究,并首先鉴定出西周的甲骨文。在青铜器研究中,强调“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五因素综合研究,推动制订西周金文历谱,在分期上取得新成果。在战国文字研究中,率先提出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五系说”,使这一学科分支趋于成立。在简帛研究中,参加整理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等多种珍贵材料,并将简帛学与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共发表学术论文 500 多篇,专著 20 余部,在学术界具有巨大而广泛的影响。